

学林出版社

文化的主 流和支流

郭太风 著

文化的 主流和支流

郭太风 著

学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化的主流和支流/郭太风著. —上海: 学林出版社,
2002. 5

ISBN 7-80668-305-4

I. 文… II. 郭… III. 文化—研究—中国
IV. G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25641 号



文化的主流和支流

作 者——郭太风

责任编辑——李晓梅

封面设计——朱 也

出 版——学林出版社(上海钦州南路 81 号 3 楼)

电话:64515005 传真:64515005

发 行——新华书店 上海发行所

学林图书发行部(钦州南路 81 号)

电话:64515012 传真:64844088

印 刷——江苏常熟第四印刷厂

开 本——850×1168 1/32

印 张——9

字 数——20 万

版 次——2002 年 5 月第 1 版

2002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2000 册

书 号——ISBN 7-80668-305-4/C·9

定 价——16.00 元

前言

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马克思主义、中华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在中国冲撞激荡,相互之间有融合,也有排拒。这三大类文化所处的地位,同政治形势密切相关。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的五十余年,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在全国范围内处于主导地位,如何对待另两类文化,是人们感兴趣的问题。

近二十年来,我国的文化研究成果颇为丰硕,出版了许多有价值的学术论著,推进了我国的思想文化建设。但“文化热”中也存在赶浪头和把握失度的问题。20世纪80年代批判“文化大革命”的封建性时,似乎西方文化都是反封建的良药,从抄搬萨特存在主义到鼓吹三权分立的政治制度,西方文化思潮汹涌而来。1989年那场政治风波后,中华传统文化的救世功能又被过分“弘扬”,以抵御西方文化的“入侵”,以致对传统文化本身也良莠不分,从宣扬神医异功到张扬“天下主义”,可谓无奇不有。

近些年来文化争鸣的一个显著特点是思想开放,多角度“反思”,关注中国的现代化和未来的命运。上个世纪末出版了好几套文化论集,入选的论文大多撰写于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末。选编者的兴趣在于面向21世纪的中国文化建设。选编的标准除了学术性外,注重现实针对性强、观点新、有代表性的文章。这几套文化论集销路不错,阅读层面较宽广,其影响力越出了文化学术圈。从这几部论集的序言看,有主张“和而不同”、“多元互补”文化观的,^①有主张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文化观的前提下,“批判继承,综合创新”的,^②也有欣赏自由主义、质疑当代主流

文化的。例如,《20世纪中国思想史论》的序言称,“现代社会主流思维的科学精神,其实质不过是一种工具性理性”,“在终极的信仰层面、在意义的世界里,完全是主观的、非理性的,对你是神的东西,对别人可能是魔鬼。”而“自由主义在价值问题上是中立和缄默的,它宁愿把信仰留给宗教而自我缺席。”^③在该书内容提要中特地说明:“全书各论文立论严谨,有冲击力。”《知识分子立场》丛书的“编选说明”认为,“激进主义、保守主义、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给中国现代化带来的影响已成为不争的事实”,“这些论争已经并将为中国思想界带来重大影响。关注这些论争对于我们理解现实变革和思想嬗变都有重要意义。”^④

在文化讨论中,“主义”数以百计,无奇不有,既有华夏中心主义、天下主义,也有世界主义、后结构主义。有些论者认为,不同的文化观点可区分为马克思主义、保守主义、自由主义三大类。然而,对于同一“主义”的理解存在很大的分歧。

海内外不少研究中国文化的学人喜欢用“保守主义”、“自由主义”、“激进主义”等词汇来界定某些文化学说或流派,但运用此类词汇的指意往往不很明确,甚至相互矛盾。“保守”两字既有维持现状、不思进取之意,也有保卫坚守的含义。在欧美学术界,保守是中性的概念,是对文化或政治观点上主张稳健和维护现状的一种表述。保守或保守主义一经用到中国,政治上是贬义的,由守旧引申为自我封闭、落后愚顽、阻碍变革等。在近些年的文化研讨中,保守的概念被随意套用,辞意含混不清。有些论者认为保守是相对革命的激进而言的,反对社会剧变和否定革命的思想文化都属于保守主义。有些自称为自由主义的论者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事业视为保守的,把站在反对立场的思想言论归为“激进”的,但他们又时常被称为“政治保守主义”。

新儒学通常被论战对手归入“文化保守主义”而受到批评。然而,新儒学有宋代、民国初期和当代之分,在不同历史时期的作用也难以用保守还是进步笼统定性。在清末民初,救亡图存已成为近代中国的历史主题,在反思历史、探寻救国救民真理的过程中,不少书生士子猛烈批判传统文化,从国情和文化中寻找中国积弱、受列强欺凌的原因。新文化运动兴起之初,文化自责风气应时而起,在反封建的呐喊声中张扬西方文化的先进性。那时的新儒学以传统文化捍卫者的角色与之对抗,“保守性”颇为浓重。当代新儒学批评西方文化中的个人主义价值观和过度竞争造成的危害,颇注重于发掘传统文化中的“现代性”,时而闪现有价值的思想亮点,不宜用“保守”概括之。少数当代学人提出用新儒学取代中国的主流文化,则其意越出了学术范围,更不宜用“保守”或“激进”之类的词汇来论析了。

自由和自由主义的概念也不甚明了。“自由”概念源于古代希腊,原意为思想宽容,尊重个人自由。在欧美资产阶级改良运动中,自由概念同人权不可侵犯、限制政府权利等概念相联系。今天,自由主义在西方通常为社会中上层所拥护。自由主义理论传入中国后,便成为政治指向强烈的文化思潮。当代研究中国问题的自由主义者无不聚焦于中国选择的政治道路,因而可称之为当代政治自由主义者。当代政治自由主义者对五四新文化运动“全面反思”,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是近现代中国选择错误道路的关键。向前追溯,则指责辛亥革命使传统君主统治突然中断,思想文化陷入混乱;往后推论,则把由此生成的“严重错误”不间断地延伸到“文革”,乃至今天。他们美化改良,否定革命,其目的是要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和建设事业归结为一场旷日持久的“乌托邦政治运动”,否定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其现实出发点是指责中国搞社会主义不如搞资本主义。

近现代中国改革和革命的大方向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五四新文化应该“以苏俄为师”,还是“以英美为师”?当代中国思想文化应该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还是应该听任自由主义逆转为主流?这类根本性的大是大非问题,即使研究者抱着纯学术的初旨进行探讨,也很快就会发现,这关系到政治评价问题。何况,实际情形是若干研究者原本就以否定现实政治为出发点。海外学人余英时告诫他在国内的追随者,要善于“退而结网”,在政治领域退而求进,在学术领域大胆进攻,把中国的社会主义当作封建主义来批,从而“重新估定一切价值”。李泽厚提供的策略是“思想家淡出,学术家凸出”。

民族主义概念同样被误用、滥用。近代民族主义是随着欧洲资产阶级国家产生而形成的一种有特定指向的概念,不宜用来评析中国古代的历史文化,更不能随心所欲地套用来评析当代中国的内外政策和思想文化建设。抨击中国搞民族主义的那些人,把子虚乌有的“天下主义”等同于杜撰出来的“华夏中心主义”,把爱国主义说成是民族主义的“代名词”,提出要对一百多年来中国的爱国主义“进行一番深思”,而把近代列强东侵和欧美文化中心论统统说成是“世界主义”,提出当代中国必须全方位地加入“世界体系”。国内各民族的团结,祖国统一大业的完成,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兴旺发达,对外经济文化交流的健康进行,都需要发扬中华民族团结奋斗的精神,这同狭隘的“民族主义”是毫不相干的。

由于“主义”过于庞杂,理解多有歧义,很难用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来界定。本著作选评含义较为明确的新保守主义、当代新儒学、当代政治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兼及其他相关的“主义”。

4 如何对待外来文化思潮和种种学说,不仅仅是单纯的文化

学术的问题。进入近代,欧美资产阶级文化向世界各地施展影响,所依托的是先进的生产方式。那时,中华文化仍在封建故道上缓慢移行,力图维护自尊和陈旧的政治机制、经济基础。在这一历史背景下发生的中西文化冲撞,是先进与落后的较量。但这种冲突以血与火的形式展开,侵略与反侵略、民族奴役与争取解放贯穿近代历史文化。因此,这也是正义与非正义的斗争。西方文化在近代中国人面前展示了它的先进和侵略的两重性。一百多年来,一批又一批的中国人学习西方文化,探索民族独立和强国之路。与此同时,中西文化冲撞、交汇的深度和广度都在发展。相互理解、取长补短这一对待中西文化交流的正确态度被多数人接受。但中劣西优的思维定式还有残余影响。思想意识现代化有别于全面西方化,观念更新要谨防唯洋是崇。

“大文化”的讨论不可避免地会涉及到对近现代历史的评价。改良与革命孰是孰非,近现代中国应该走什么道路,成为文化讨论中现实针对性很强的历史政治评价问题。

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面临的形势和主要任务不是如何通过改良去发展资本主义,也不是如何张扬自由主义去发展民主制度,而是民族独立还是国家主权继续沦丧,人民得解放还是继续受压迫受剥削。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运动使中国成功地跨越了“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使灾难深重的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免受再一次的屈辱和痛苦。本著作列入马克思主义史学观在中国这一专题,意在说明历史文化研究的任务是解释历史,而不是否定或假设历史。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指导思想。中国先进知识分子运用唯物史观指导历史文化的研究,历史学才真正进入了研究的科学轨道。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者都认识到,研究历史文化要探究其发展规律和中国的具体特点,并服务于现实,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

文化有主流与支流之分。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的八十余年,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从革命的思想文化发展为主流思想文化。在文化研讨中,对毛泽东的评说也是热门话题,而且时常涉及到当代主流文化,观点分歧很大。长期以来,理论界和某些文化圈各说各的,几乎成为互不搭界的“两张皮”。多数理论工作者致力于“正面弘扬”当代政治理论,对某些文化圈里的观点不怎么关心,或者不甚了解。而某些文化圈里的人则以“文化问题”为切入点,批判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和一切“特色理论”,还美其名曰“学术理论创新”。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扬弃中继承优秀传统文化、学习外国先进文化?还是盲目追求“西化”,陷入民族虚无主义?这在理论上似乎已经得到解决,但在人们思想深处仍有不同理解。本著作最后三个专题分别论述三代领导人的文化思想,尝试将主流思想文化与某些文化思潮放在同一部书里面作一对比。对于笔者来说,这是有相当难度的,不当之处,诚望学术理论界同行批评指正。

毛泽东思想与毛泽东个人的文化思想有所区别。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是被实践证明了的,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理论和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毛泽东个人的文化思想特色鲜明,体现个人性格、时代特征和中国气派,但其中一些错误的言论不属于毛泽东思想这一科学体系。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作了全面的评析,在今天有关的思想文化研究中仍具有指导意义。

邓小平理论是对毛泽东思想创造性的继承和发展。将两者截然对立起来的观点是错误的。邓小平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使人们观念更新,使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实现历史性的突破。以改革开放为旗帜,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一战略决

策是对我国过去社会主义建设中存在问题的纠偏,更是创新和发展。改革,不是改变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性质,而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在思想文化建设方面,邓小平强调加强民主与法制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改革开放是强国之策,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立国之本。

江泽民倡导以德治国与依法治国有机结合,主张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民主。他提出“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侧重于党的建设。江泽民的文化思想内涵丰富,吸取了历代“老祖宗”的精华,突出马克思主义思想文化建设的先进性、时代性、前瞻性,兼顾民族优秀文化的特点和育人功能,具有普遍的适用性。他在“七一”《讲话》中指出,要“积极进行文化创新”,“必须具有世界眼光”,“充分体现时代精神和创新精神”,不断发展社会主义文化。

随着我国改革的深化,对外交往的扩大,各种思想文化观念大量涌现,人们的思想空前活跃。进步的观念和落后的观念相互冲撞,正确的思想和错误的思想交错并存,在社会上、理论界、文化学术领域都产生一定的影响。对于思想文化丰富而庞杂的现实状况,江泽民提出要分清主流和支流,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指导思想决不能搞多元化。

不拒细流,方成滔滔长江大河;反之,不消除支流中的污染,主流中的生命活力也会受侵害;然而,主流只有一条,支流不能取代主流,否则便会造成水灾。如果动摇了马克思主义的主导地位,动摇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就会导致思想混乱,社会动荡。这方面的教训是深刻的。

作 者

2001年11月

注释：

① 费孝通：《中华文化在新世纪面临的挑战》，见《〈中华文化与 21 世纪〉代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0 年版。

② 方立克：《批判继承 综合创新》，见《〈走向 21 世纪的中华文化〉代序》，山西教育出版社 1999 年版。

③ 许纪霖：《〈20 世纪中国思想史论〉序》，东方出版中心 2000 年版。

④ 李世涛主编《知识分子立场》丛书的编选说明，时代文艺出版社 2000 年版。

目 录

前 言	1
第一章 当代新儒学的是非得失	1
一、当代新儒学产生的时代背景及思想渊源	1
二、“儒学文化圈”与东亚经济奇迹	10
三、第三代传人推进新儒学世界化	17
四、“儒学复兴”与文化保守主义	21
五、传统文化是良莠并包的双刃剑	28
第二章 新保守主义的多侧面和复杂性	40
一、欧美新保守主义思潮与权威政治论	40
二、新权威主义无视民权和民生	44
三、新保守主义的忧患意识失之于皈依传统	51
四、“新左派”对社会主义的不同见解	59
第三章 当代政治自由主义思潮的泛起和涌动	73
一、从“意识危机”到“后学”汇成冲击波	73
二、批判“文化激进主义”，主张“以英美为师”	82
三、曲解乌托邦，否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88

四、美化改良,否定中国革命和道路选择	95
--------------------------	----

第四章 民族主义概念的误用与辨正

一、民族主义和“天下主义”概念的辨析	107
二、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崛起	118
三、民族主义概念被误用滥用	123
四、振兴中华民族,与民族主义无关	129
五、国际民族矛盾与经济竞争	134

第五章 中国国情与马克思主义史学观的发展

一、马克思主义史学观的引入和初步运用	140
二、辨析亚细亚生产方式科学内涵的现实意义	144
三、考辨中国古代社会性质,关注近代中国走向	149
四、史学研究与革命理论相互促进	157
五、跨越卡夫丁峡谷的启示	161

第六章 毛泽东的文化思想体现中国气派

一、中华文化铺根基,马克思主义为主干	174
二、倡导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观	177
三、中国气派的革命理论	181
四、开创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	191
五、“毛泽东热”与理想主义	195

第七章 邓小平理论富有时代气息的创新

一、从毛泽东思想到邓小平理论	206
二、全方位改革开放对包容性的超越	212
三、倡导精神文明建设意义深长	222

第八章 江泽民的文化思想内涵丰富·····	231
一、先进文化与时俱进·····	231
二、标本皆治,搞好党的思想作风建设·····	237
三、正视社会问题,推行德治法治民主化·····	249
四、分清文化的主流和支流,指导思想不能搞多元化···	258
五、发扬优秀传统文化的现实功能·····	267

第一章 当代新儒学的是非得失

当代新儒学大力弘扬中华传统主流文化,注重于发掘其中的“现代性”,曾经起过独特的积极作用,并产生颇为深广的影响。但是无限度地张扬传统文化的现实功能,不免失之偏执。新儒学在当代复兴,既是传统文化历史穿透力的反映,也夹杂着复杂的现实因素。对当代新儒学追根溯源、正本清流,才能在扬弃中剔除糟粕,取用其有益之处。

一、当代新儒学产生的时代背景及思想渊源

1958年,台湾学人唐君毅、牟宗三、张君勱、徐复观在香港联名发表4万言的《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①,通常被认为是当代新儒学兴起的标志。该《宣言》呼吁“研究中国学术文化者,须肯定承认中国文化之活的生命之存在”,认为“心性之学,正为中国学术思想之核心”,并全方位阐发其现实功能。《宣言》推论道,“中国文化依其本身之要求,应当展现出文化理想,是要使中国人不仅由其心性之学,以自觉其自我为一‘道德实践的主体’,同时要求在政治上,能自觉为一‘政治的主体’,在自然界、知识界成为‘认识的主体’及‘实用技术的活动之主体’。”在中西文化关系问题上,《宣言》主张中西文化应该相互学习,但重

点放在张扬中国文化的外向能量,暗示中华文化具有匡时救世的作用。

历经四十余年,当代新儒学从台湾部分学人的一家之说发展为有相当影响的文化观,在海外华人知识界得到广泛认同,近些年来也引起中国大陆一些学人的兴趣。已有的研究集中于当代新儒学的学理及其现实功能,对《宣言》发表的时代背景很少涉及。本文第一部分就新儒学产生的背景情况试作分析。

20世纪50年代及60年代前期,台湾的思想文化处于极其混乱的状态,这同日本过去在台湾推行奴化教育和国民党当局实施文化专制政策是有直接关系的。甲午战争后,日本侵占台湾达50年之久。日本殖民者在台湾强制推行奴化教育,企图把台湾人训练成“守法、合作、有纪律、整洁的、合乎日本所用的人。”抗日战争期间,日本将奴化教育升格为强制推行“皇民化”^②。日本殖民者曾在学校里全面禁绝汉文,并禁止台湾青少年学习政治学、法学、哲学等人文社会科学。日本殖民教育的核心内容是从文化和心理上破坏中华文化的影响,其根本目的是要将台湾人同化为日本帝国主义的“忠臣良民”。日本推行殖民文化政策,培养出了一批“奴化”的知识分子,但大多数台湾知识分子和民众在感情上是无法接受“皇民化”教育的。台湾居民与祖国大陆有着割不断的根与血缘关系,对中华传统文化怀着深深的依恋。然而,在日本殖民统治时期,他们很难得到祖国大陆的出版物,尤其是戊戌维新运动以来中国出版的优秀图书在台湾几乎绝迹。

1945年抗战胜利后台湾回归祖国。1949年国民党败退台湾,海峡两岸正常交流再度中断。国民党当局出于反共保台的需要,在整个50年代出版大量政治方面的书籍,宣传三民主义和“反共复国”,大搞“战斗文学”,同时实施文化专制政策,使台

湾的文化事业长期得不到正常发展,因而台湾在那时有“文化沙漠”之称。

台湾的乡土文学在 50 年代曲折发展,与国民党当局的政治标准不相符合。乡土文学起源于 20 世纪 20 年代,用文学的形式暴露社会黑暗,反映民族意识,反对日本殖民统治,既有浓厚的台湾地方色彩,也内含对故土乡情和祖国大陆的怀恋之情。50 年代的台湾乡土文学,特指内容和语言皆源于台湾乡土的文学,描绘民间的日常生活和悲欢离合,同官方文化保持距离,离心倾向若隐若现,但总体上处于低迷状态。

现代派文学崛起后,虽然给台湾文坛带来些许生机,但受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理论的影响,时常播传“西化”思想,也使台湾当局感到难以容忍。对于抨击时政的团体和刊物,台湾当局严防防范,并给予严厉打击。即使其初旨在于宣传西式自由民主和鼓吹反共的“自由人”组织,也使台湾当局感受到“自由主义”的威胁,当局对这一组织进行分化瓦解,最终断然予以镇压。“自由人”于 50 年代初在香港成立。不久,部分人员转赴台湾,有的还当了大官。港办《自由人》刊物起初宣传反共,50 年代中期起屡屡发表文章揭露国民党黑幕,台湾当局斥其“言论记载愈益离奇”,禁止该刊进入台湾。《自由中国》创办于 1949 年 11 月,创办阶段由胡适担任发行人,50 年代初起改由“自由人”雷震担任。受胡适的自由主义思想影响,《自由中国》在 50 年代中后期批评国民党政府,宣传西方自由民主学说,并筹划成立反对党“新党”。台湾当局不顾岛内外一片反对声,于 1960 年 9 月逮捕雷震等 4 人,将其中 3 人判了重刑。

国民党政权在大陆时期就反对走英美式的资本主义道路,在思想文化领域里批评“自由主义”,败退台湾后更害怕自由主义思潮动摇其统治思想。但一味宣传蒋记三民主义,又得不到

当代新儒学的是非得失

3